

关注·新兴领域民兵建设

克孜勒苏
军分区

探索预征装备保障新机制

明确“政府负担为主、企事业单位分担为辅”

本报讯 史新慧、刘玉琼报道：“迅速启动预案，向各分队下达预先号令，快速向事发地点集结……”前不久，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一场以应急处突为背景的实战拉动综合演练在高原某地进行，无人机侦察、装备维修、桥梁抢修、信息网络等多支新质民兵支援保障分队悉数登场亮相。演练现场实战氛围浓厚，多种预征装备在复杂环境下竞技，装备性能得到了有效检验。

近年来，该军分区紧盯高新技术行业编兵，将人员编组向人装结合编组拓展，对战斗力建设的贡献率不高。在一次演练检讨反思会上，一项项装备训练维修开支问题摆上了军分区党委的案头。新质民兵分队装备维修、改装经费不是小数目，民营企业怕出钱、怕维修，平时只用老旧装备进行演练。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该军分区积极与当地政府协调，组成专项工作小组，深入政府相关部门、编兵企业、演

兵场展开调研论证。他们把新质民兵分队建设经费统筹纳入财政预算，对接任务需求购置配齐装备器材，探索出“政府负担为主，企事业单位分担为辅”的保障机制，打破了以往按比例均衡开支的模式。

笔者了解到，凡是遇到重大演习、抢险救灾等大项活动，特事特办，急事快办，民兵事业费申请额度最高可达50万元。同时，该军分区砍掉与战斗力无关的项目，把经费向战斗力聚焦，向装备训练保障维修倾斜。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出台了一系列福利待遇政策，为编兵

企业减免税费，规定训练误工的民兵工资和奖金照发，并提高了训练补助，切实解决了编兵企业和参训民兵的后顾之忧。

新的保障机制出台后，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改装无人机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复，操作手脱产训练，维修经费也在第一时间到位，该企业领导兴奋地说：“以后参加民兵训练可以放心使用无人机了。”

新质装备助推战斗力飞跃提升。在一些“高精尖”的训演课目中，新型民兵分队的高新装备运用自如，训练难点问题被逐一解决。

点 评

■李代平

武器装备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战斗力建设。如果没有相应配套的服务保障，预征装备就很难满足未来战场需求。

新疆克州军地积极主动作为，敢于直面问题困难，下大力气破解新形势下民兵预征装备保障遇到的新问题，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



5月16日，河南省扶沟县实验小学“姜鸿起中队”授旗仪式在姜鸿起烈士纪念馆举行。图为县文武部领导和姜鸿起烈士家属为英雄中队授旗。

郭超摄

本报讯 耿喆辉、记者裴贤报道：5月27日，军事博物馆军事科技展厅向社会公众开放试运营宣传活动在京举行。记者现场获悉，经过数年筹建，军事科技展厅将于6月1日面向公众开放。

军事科技展厅是国内首个将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科普知识系统化呈现给观众的场馆。某参建企业代表贺明介绍，该展厅以作战能力为主线，以典型装备为支撑，采取现代高科技和传统展示方式，综合运用多种展示手段，突出技术性、科普性和互动性，充分运用多媒体、

军事博物馆军事科技展厅
于6月1日面向公众开放

机电一体化、虚拟现实等手段，增强了观展趣味性和参与度。

据介绍，他们还将以红色文化为引领，建设国防科普领域的文创产业研

基地和信息化大数据平台，实现国防教育“基地互动体验+远程教育可视化”融合发展，助力军事博物馆“传承红色基因，打造强军文化，服务强国战略”！

(上接第一版)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不由得想起牺牲的战友。“太多了”——他总是用这3个字，来感叹牺牲的数量，表达心中的哀伤和缅怀。

他的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牺牲了一个又一个。一次突击，突击组成员大多都回不来。一次战斗，连队就少很多战友。每次看到熟悉的面孔不在了，他的心便特别沉重。

他的老部队——5师14团，1949年9月14日翻越祁连山。途中，“整日雨雪交加，狂风不止，战士全身湿透，受冻牺牲130人，冻坏脚不能走路者100余人”。战场血战，永生萦怀。永丰战役，他所在的2营6连，一夜就换了8个连长，全连几乎打光了。战斗结束后，他被战友挽回，卫生员赶紧给他处理伤口。他发现，自己带的两名突击组员没回来，也找不到遗体。他深感自责：没把两个战友照顾好，自己还活着，可他们牺牲了，连掩埋一下、立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啊！

枪声歇息，夜幕降临。他抱着冲锋枪，一宿未眠，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来。不是因为伤到痛，而是心痛！一想起两个瘦高的兄弟，他就痛哭失声……

越是铁骨，越是柔情。每当清明，他都避开亲人，遥望远方，一个人静悄悄地待一会儿，默默祭奠牺牲的战友，任凭泪水顺着脸颊肆意流淌……

“和牺牲的战友比，我是幸福的！”擦干眼泪，张富清内心充满知足和感恩，更充满继续奋斗的勇气。

每次，都是“最需要的地方”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一声令下，深爱部队、一身打仗本领的张富清，纵怀着万般不舍，也毅然脱下军装。

1953年7月，张富清被派往防空部队文化连成中学学习，先后在天津、南昌和武汉学习两年文化课程，同批学员毕业后集体转业。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干部。张富清有3个转业去向可以选择：一，留在城市，生活条件好，发展空间大；二，回陕西老家；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新中国成立了，仗也打完了，母亲一直盼他回去。打了那么多仗，母亲只是收到报功书，却见不到儿子的踪影。日夜思念，“谁不想到好一点的方地方？从内心讲，我想回陕西老家，但我没有说。因为我是党的干部，就应该听从组织召唤，到艰苦的地方去。”张富清的想法简单而朴实。

校领导在介绍湖北情况时说，恩施偏僻艰苦，最需要干部。他一听，就要求到恩施。随后，他又到了来凤——因为在恩施，来凤地处鄂、湘、川交界，最偏远。

“为什么？”

“那里苦、条件差，共产党员不去，哪个去？”他心头涌起的，是当年战斗突击时的豪气。

1955年1月，张富清和妻子孙玉兰坐轮船逆水而上，从武昌到巴东，然后赶往恩施。当时，从恩施到来凤，坐车要走一整天、“两头黑”。

“凤凰来仪”之地来凤，虽有美丽传说，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高山丘陵，交替连绵”“河流沟溪，纵横交织”。夫妻俩一脚踏进这片土地，一待就是64年。

孙玉兰，是张富清探亲时认识的同村姑娘，当时是村妇女主任、共青团员，虽小他11岁，但认准了这个军人。他们

在武昌结婚。

到来凤，张富清的第一个职务是城关镇粮油所主任。粮油所主要保障城镇非农业人口。在粮食短缺的年代，这个岗位“权力很大”。

他的第一个难关不是苦，而是要不要坚持原则。当时，所里仅有一台碾米机，难以保障供应，只能供应一部分细米、一部分未完全脱皮的粗米。许多群众拿着粮票买不到细米，意见很大，经常与粮店工作人员发生口角。

一天，一家单位的管理员来买米，要求多供应一些细米。

“现在没有多余的细米，只有粗米。”张富清解释说。

“我只要细米！”管理员口气很硬。

“你们要吃饭，群众也要吃饭，我只能按规定供应，等有了细米再通知你。”

张富清的答复，令这位管理员既无语又不满。后来，这个单位找到县里一位分管领导。这位领导“提醒”张富清：“该照顾的单位，还是要照顾。”他却毫不松口：“供应我一视同仁，要不就违反了党的政策。”

张富清想，要减少矛盾，提高碾米量才是根本办法。他先发动社员帮忙加工，又辗转买来几台碾米机，基本解决了供应难题。

以前那个跟他争吵过的管理员，后来在营业处见到他，主动向他道歉，还跟别人说这个部队下来的干部是个好干部。

1955年9月，来凤县粮食局党支部对张富清进行考察，结论是：“能够带头干”“群众反映极好”。1956年5月，他被提拔为粮食局副局长，任职不久，便到纺织品公司任党支部书记。1957年3月，县里安排他到地委党校学习，毕业后，他又一次被派往最需要的地方——农村。

驻村，“比打仗都难”

1959年初，刚从党校毕业的张富清，被上级派到来凤县出了名的穷地方——三胡区任副区长。

当时，城里的人常这样打趣三胡区：三胡的人，都是吃稀饭的，如果在县城看到谁衣服上有稀饭渍，准是三胡的。

此言不虛。到了三胡，张富清发现，这里的财贸工作和农业生产都比较落后，营业计划完成不成，粮食生产任务也完不成。

在张富清的努力下，用了一年时间，三胡区基本实现区营业单位扭亏为盈，但更难啃的骨头在农村——提高粮食产量。在区里统一安排下，他开始上山驻村。

到三胡后，张富清才知道什么叫穷：很多群众几乎顿顿以菜代饭，有的群众没衣裳，“用线把烂布片连起来遮丑”……

贫困的情景，令张富清感到肩头和心头一样，沉甸甸的。

他经常拿出部分工资接济乡亲，但毕竟杯水车薪，有时连燃眉之急都解不了。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过去打仗死都不怕，现在还怕困难吗！”

张富清走进最偏远的村，住进最穷的社员家。在社员家里，无论吃的是玉米、土豆、红薯，还是野菜，他都按规定交伙食费和粮票：一餐半斤粮票，一天三角伙食费，一个月3两油票，三五天结一次账。

虽然他交的伙食费，远比吃到嘴里

为尽快让社员相信他是帮忙而不是添乱，他和大家天天一起上山干农活，并留心观察，虚心学习各种劳动技能，“手上的水泡从没断过”。

“背粪上山，社员背多少我背多少，身上、衣服上，经常沾得到处都是粪……”他知道：同大伙儿一样出力，社员才会相信他是真心的。

那时，家家房子不宽裕，更没有多余的床。他就找间柴屋，铺上稻草当床。晚上，刚躺下，蚊子、跳蚤便开始“联合攻击”。他拿手帕、衣服驱赶，实在赶不走，干脆把手帕盖在脸上睡。早上起来，浑身是包。后来，他找来六六粉撒在地铺上才好一点，但只能管个把星期。

不管多苦、多累、多困难，张富清一天到晚总是笑呵呵的。他陕西口音重，怕社员听不明白，就总是放缓语速，慢慢地说话。

晚上，他组织干部研究村生产计划，向社员宣传党的政策；空闲时间，他帮社员打院子、挑水……

社员吃不饱，他更吃不饱。可当着社员的面，他不能表现出来。有时饿得难受，他就一个人跑到水井旁，舀点水喝，然后接着干。

一天晚上，张富清回区里开会。由于干了一天农活，吃得又少，加上走了几十里山路，当路过一座桥时，又累又饿的他一头栽进河里。

同行的赶紧把他救了上来，这才躲过一劫。赶往医院的孙玉兰看到受伤的他，心疼地说他“命真大”。

每月，张富清至少驻村20天，只有回区里开会才能回趟家。农忙季节，他就一直和社员抢种抢收。孩子们想念爸爸了，就翻过一座山，跑到村里去找他……

“说实话，下乡驻村的时候，比带突击组打仗都难。”回忆起当时的艰辛，张富清至今感慨。

“最幸福的是回到家里，吃上一碗妻子做的家乡的菜疙瘩，一家人说说家常。”

有两位驻村干部吃不了这些苦，宁愿放弃干部身份，悄悄去抓黄鳝挣钱。

可张富清从没想过放弃，他只认一个理儿：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共产党员不干，谁干？困难面前，共产党员不冲，谁冲？

春风化雨。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们对张富清，从抵触到有感情，最后情同手足。最令他欣慰的是，所驻的村生产抓上去了。

但是，一个村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带起来，他又要到另一个困难村去。少则一年，多则两年，他就要转移一次“阵地”。20年，他总是从一座山，搬到另一座山。

他和他们，“已如土地和庄稼”

十年浩劫，张富清也未能幸免。1975年恢复工作后，他被调往卯洞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虽然挨过整，虽然已年过半百，可他依然跟从前一样，大部分时间去驻村，还把地点选在不通电、不通公路的高洞村。

1977年，国民经济好转，卯洞公社决定集中财力物力修两条路，其中一条是高洞到安抚司的公路。

路，是高洞父老乡亲的所思所盼。上任时，张富清沿着挂在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走了4个多小时才到高洞，对交通不便之难感受颇深。

修路时，张富清一直柳在那里，负责施工难度最大的路段。他说：“党员干部

就应该带头啃硬骨头。”

冬季农闲，是修路的好时机，但空气湿冷。为加快修路进度，他带着修路大军在山上安营扎寨。有的人不想上工，他就耐心去动员。

每天天刚微亮，他就起床，吃过早饭立即带领大家上工地，一直干到满天星光。哪里难修，他就赶到哪里。

没有专业工具，就用农具开山挖土，靠肩挑背驮运石头，修路基。碰到大石头，实在凿不动，才舍得用贷款买来的炸药，节省着一点点炸。

施工强度高，粮食却很少。当时工地上流传一个来凤方言的“顺口溜”：“早上浑个中，中午剩一剩，晚上现场和”，意思是一天三顿都是吃土豆。

断断续续干了两三年，路终于修通了。虽然是条泥土路，但自行车、摩托车、拖拉机都能开进高洞。

那些年，张富清打的攻坚战一场接一场。卯洞的金丝桐油和茶叶品质好，尤其是桐油，“浓度高，色泽金黄，粘之可扯成丝”。当时，社员们靠山吃山，却“吃”错了方向，没用好这棵“摇钱树”。

张富清看得既远也准。他一方面加强老林管理，牵头建立护林员制度，禁止砍伐和放牛；另一方面带领群众开荒植树，把四五千亩的山坡变成梯田，栽上油桐树和茶树。

他还到广西一些山区考察，借鉴经验，办起林场。此外，他还组织群众办起畜牧场，既解决了吃肉的难题，又有了种树所需的农家肥。

两年后，汗水换来收益，每个小队年收入都增加了两三千元以上，群众生活明显改善。

很快，卯洞的林业发展在全县出了名，县里召开现场会推广，外省的同志也来参观。

令张富清欣慰的是，如今的卯洞，又开始加速发展油桐，还打出了“来凤桐油甲天下，卯洞桐油甲来凤”的广告。

1979年夏，随着一纸调令，55岁的张富清要离开卯洞，离开大山，回县城任职。他心不甘而志，群众依依不舍。他对这片大山倾注的深情，山里的老百姓感受得真真切切。

一时间，许多群众打算翻山越岭到卯洞来送别。公社连忙通知：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每村派一名干部代表和一名群众代表即可，不要要求人太多。

即便下了通知，张富清走的那天早上，一开门，仍满眼是人。有的社员是头天晚上赶来的，竟在门前坐了大半夜；有的要送他自己做的小竹椅，有的捧着吃的东西……

令他泪湿双眼的，何止这一次！当年，他被打倒，停发工资，断了生活来源，但早上一起开门，常常发现门口放着些米面和菜。悄悄送来，不留姓名，至今不知是谁送的。

除在党校学习两年外，张富清共在山区工作20年。20年间，他和大山里的老百姓如土地和庄稼，紧紧地连在一起。

“我可以照顾你，群众怎么办？”

张富清转业初期，按照国家政策，妻子孙玉兰被招录为公职人员。

1961年，时逢三年自然灾害，为了共度时艰，国家开始精简人员。

此时，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孙玉兰也调到三胡区供销社上班，供销社归他分管。为了顺利推动人员精简工作，

他率先动员妻子放弃“铁饭碗”。

“我又没出问题，没犯错误，为什么拿我开刀？”一开始，孙玉兰想不通。

“执行党的政策，不从我做起做起，怎么落实？”张富清劝说妻子，“你下去了，我才好做别人的工作。”

妻子“下岗”了，人员精简工作顺利完成。

1955年至1962年，张富清的4个孩子先后出生，两儿两女，家庭负担本来就重，少了一个人的收入，生活更加捉襟见肘。曾喜欢抽点烟、喝点酒的张富清，全都戒了。

1963年，孙玉兰找师傅学缝纫，“每天只能挣两三角钱”。孩子们下午放学，先去地里捡别人刨剩下的土豆回来当晚饭。小儿子张健全对童年最深的记忆，就是饥饿。

上世纪70年代，恩施市有家国企来县里招工。张富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大儿子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去当知青。

他开导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但更是党的干部，我可以照顾你，群众怎么办？”儿子很理解，到林场住在茅棚，种地、植树，一干就是几年。

“人，要靠自己。如果考不上学，自己想办法，不要指望我。”张富清对孩子不打不骂、不说重话，但他的以身作则，就是威严。

今天，这个家的家风依然。

他的4个孩子，除大女儿因工伤致残外，其他3个都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学，当上了干部或职工，没有一个沾过父亲的光，没有一个在他任职过的单位工作。按照他的“规定”，此次各路记者采访，除了小儿子张健全，其他子女、孙辈都不能露面。

“和牺牲的战友比，我很满足”

张富清的生活简朴是出了名的，有人说他“有吃的不吃，有用的不用”。

他说：“我不是留恋过去，而是要有个满足。”

他心里埋着一个几十年不变的参照系——牺牲的战友。采访时，他说：“和牺牲的战友比，我还活着，吃的住的都好，我很满足。”

多年来，张富清养成一个习惯，每月工资发下来，先交党费，再买生活必需品，留出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最后轮流给孩子添置一些衣服。再紧张，决不超支。

然而，也有例外。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母亲病危。手捧家里接连寄来的两封信，张富清却没能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

除了任务重、路途遥远，就是缺钱。他当时一个月工资30多元，几乎没有余钱。从单位借了200元寄给母亲看病后，张富清再没路费回去了。

当时，买不起布，孙玉兰就买尿素袋染色后做衣服。儿子张健全回忆：“我的一些衣服经常印着‘含氮量’的字样。”

张富清也一样，平均每条裤子要换3次补丁。1978年暑假期间，儿子女儿每天靠搬石头、晒辣椒挣钱，攒了9块多，为他做了一条黄色的确良裤子。也是从那时起，在家的再三要求下，他才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

在三胡时，他全家住一间小屋，只够放一张床，“挤兑全家”（恩施方言，全家挤在一起），门勉强能打开，做饭的炉子放在门外，下雨时再搬到屋里。

后来生活好了，张富清也从不下馆子。逢年过节，拗不过儿女们的心意，到

饭店聚餐，他总是先约法三章，规定钱数，不许铺张。

如今，张富清已在于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家属楼里住了30多年。当年的同事，大都买商品房搬走了，一楼租给了商户，环境嘈杂，他依然觉得挺好。

除了生病去医院，他从不坐出租车。他说，来凤县城小，到哪儿去，就慢慢走。截肢以后，他去超市都是推着助行器去，即便不慎摔倒也不在意。

“不能为国家作贡献了，更不能添麻烦”

2012年4月，88岁高龄的张富清左膝肿胀，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医生最后诊断，必须高位截肢。

“不截行吗？”

“您要腿还是要命？”

“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截了肢怎么干啊！”

“您都离休那么多年了，还有什么事要做？”

“我虽然离休了，但一直帮老单位建行开展业务。我认识的人多，大家也信任我，能帮上不少忙呢……”

“战争年代腿都没掉，没想到和平时期腿掉了！”从手术台上下下来，张富清暗自伤悲，“以后是不是就成一个废人了？什么都干不了，还要拖累子女？”

但在家人和医生面前，张富清依然乐观，未显露半点消极情绪，积极配合治疗。伤口刚愈合，他便用一条腿做支撑，先是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壁练习走路。

“我既然不能为国家作贡献了，更不能添麻烦，也不能给儿女添负担。”张富清说，“我必须重新站起来，至少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坐在轮椅上让人照顾。”

一开始，掌握不好平衡，他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头上经常磕出血，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他不小心摔破了胳膊，扶墙站起来时，墙面留下好几道血印。

靠着战场上淬炼的顽强意志，经过近一年锻炼，张富清已能借助助行器，上楼下楼，上街买菜，有时还下厨炒几个菜，实现了生活自理的目标！

说起张富清“不给组织添麻烦”，来凤县银行行长李甘霖感受最深。

“去年，张老到恩施医院做白内障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手术前，我特意叮嘱：张老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一定要选好一点的晶体。”李甘霖说，“可张老听说同病房的病友用的是3000多元的，也选了同样价位的。”

“为啥不选个好一点的？”

“听医生介绍这个也不错，就选了。”张富清说，“我都休息了，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了，节约一点是一点。”

尾声

张富清珍藏着一枚奖章。

奖章正面是“人民功臣”4个金色大字，下方刻着“西北军政委员会颁”，颁发时间是1950年。有博物馆希望收藏，张富清说：“现在还不舍得，等百年之后会捐出来。”

他珍视“人民功臣”的荣誉，却从未把自己当“功臣”。从部队到地方，从人民子弟兵到人民公仆，“人民”二字，永远写在前面、刻在心上——作为一名老兵，这是他的初心、他的坚守、他一生奋斗的源头。

（本报记者何武涛、特约通讯员朱勇协助采访）